

甲骨文的發現與寧文之辨發覆——

以王懿榮與陳介祺往來函札爲例



王懿榮致陳介祺函札信封（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）

李宗焜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18 期 2008.10

王懿榮（1845-1900），字廉生，謚文敏，山東福山人。陳介祺（1813-1884），字壽卿，號簠齋，山東濰縣人。二人對金石都有精深的研究，從他們往來的書信中，時時可見對金石的重要意見，足供治斯學者參考。而私人函札沒有學術性文章的規範限制，更可看出真性情。本文擬從二人往來的書信中，探討他們的情誼及金石上的見解，而著重介紹王懿榮及史語所收藏的王氏致陳介祺函札手稿。

一、王懿榮與甲骨

王懿榮是清末一個對金石很有研究的人，官至國子監祭酒，而他最響亮的「頭銜」是「甲骨文之父」，^①這一頭銜使他在歷史上的聲名比其他事跡更加顯赫。

這個頭銜固然冠冕堂皇，然而王懿榮對甲骨文卻沒有做過任何研究，甚至沒有說過任何話。他對甲骨文唯一貢獻是：第一個認識並購藏甲骨的人。

大家都知道，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王懿榮發現甲骨，後人並以這一年作為甲骨文發現之年，王懿榮在甲骨學史上也贏得了重要的地位。然而「此地埋藏龜骨，前三十餘年已發現，不自今日始也」，^②在此之前甲骨已陸續被發現，只是沒有人知道它的價值，直到光緒二十五年王懿榮才認定它是珍貴文物，加以鑑定和購藏。可惜還來不及做研究，隔年（1900）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王懿榮以「京師團練大臣」的身分，深感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」，^③投井殉國。後來他的甲骨大部分售歸劉鶚。

這樣看起來，王懿榮對甲骨不但沒做過研究，其所藏甲骨也是後來劉鶚才刊佈的。沒有資料證明王懿榮對甲骨有任何見解，甚至於連「購藏」一事，也都是他人的回憶或轉述。

劉鶚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的《鐵雲藏龜》自序中說：「庚子歲（1900），有范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，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，以厚值留之。後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，亦售歸文敏。」^④這大概是董作賓在一九三〇年發表的〈甲骨年表〉^⑤一文

*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一，計畫編號為：NSC93-2411-H-001-047-。

① 如呂偉達介紹王懿榮的專著名為《甲骨文之父·王懿榮》（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1995）。

② 羅振常，《洹洛訪古記》卷上，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條，頁11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三輯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6），第29冊，頁535。

③ 王懿榮絕命詞。

④ 劉鶚，《鐵雲藏龜》，清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序刊本。

⑤ 董作賓，〈甲骨年表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2.2（1930）：241-260。

中所說「王懿榮得自北京，為時較晚」的根據。董先生當時並不認為最早購藏甲骨的是王懿榮，他說：

相傳安陽小屯殷故墟出土的甲骨文字，為王懿榮所發現，但據村人所言，初購求者為古董商人范維卿。范為端方搜買古物，往來武安、彰德一帶，見甲骨刻有文字，購若干片獻端方，端喜極，每字酬以價銀二兩五錢，范乃竭力購致，村人至今以為美談。據訪聞，今端方家出售古器物，有甲骨文字，可證村人之言不虛，王懿榮得自北京在次年〔按即一九〇〇年〕為時較晚。

這是見於〈甲骨年表〉一八九九年欄的內容，認為最早購藏甲骨的是端方，而王懿榮購藏甲骨則是一九〇〇年的事。

到一九三七年《甲骨年表》成書出版時，⑥在一八九九年的內容上，加上一條「是年秋，范估以甲骨文字十二版售與王懿榮，每版價銀二兩。」⑦標示了在一八九九年秋天王懿榮曾購藏甲骨文的事實。但在此條之前還有所謂劉鶚「客遊京師，寓福山王懿榮正儒私第。正儒病店，服藥用龜版，……鐵雲見龜版有契刻篆文，以示正儒，相與驚訝」的記載，⑧有人據此認為劉鶚是第一個認識甲骨的人，陳夢家已證明此說不可信。⑨王懿榮是否在一八九九年購藏甲骨，他本人並沒有留下任何文字，都是出自後人傳聞，且說他此時購藏是「嚴密其事」的。如王國維說「初出土後，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榮。文敏命密其事，一時所出，先後皆歸之。」⑩另外，羅振常亦說「村人得骨，均以售范，范亦僅售與王文敏公，他人無知者。」⑪可見王懿榮一八九九年購藏甲骨的事，是秘密進行的。王氏生前劉鶚並未看過他的甲骨，更談不上「相與驚訝」。

此外，《甲骨年表》在劉鶚「相與驚訝」之後，王懿榮購藏甲骨之前，仍保留「山東濰縣古董商人范維卿，為端方搜買古物」的說法，則在王懿榮之前發現甲骨的，除了劉鶚還有端方。陳夢家根據各項記載，證明端方收藏甲骨文當在王、劉之後，與羅振玉同時或前後，即當光緒的末葉。端方死後，所藏甲骨輾轉歸於羅福頤，「偽品甚多」，陳夢家說「此點可推知其收藏不能甚早」，⑫這是很有力的說法。偽品應是在有利可圖之後產生的，最初發現時不應該即有偽品。

⑥ 董作賓編，《甲骨年表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）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四。

⑦ 根據明義士〈甲骨研究〉講義引范估所言。

⑧ 根據沈翁〈龜甲文〉的說法。

⑨ 陳夢家，《殷虛卜辭綜述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），第二十章，頁647。

⑩ 王國維，〈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〉，《學衡》45（1925.9）。又收入《靜安文集續編》，《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40），第15冊，頁66。

⑪ 《洹洛訪古記》卷上，頁12。

⑫ 《殷虛卜辭綜述》，頁651。

王懿榮的兒子崇煥（字漢章）在其所輯的〈王文敏公年譜〉^⑬光緒二十五年中記載：「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小商屯地方發現殷代卜骨龜甲甚多。上有文字，估人攜之京師。公審定為殷商故物，購得數千片，是為吾國研究殷墟甲骨文字開創之始。事在是年秋。」^⑭又在〈古董錄〉中寫道：「回憶光緒己亥庚子間，……估取其一（骨）稍大者，則文字行列整齊，非篆非籀，攜歸京師，為先公述之。先公索閱，細為考訂，始知為商代卜骨。至其文字，則確在篆籀之間。乃畀以重金，囑令悉數購歸。」^⑮同一個人的記述，而有「己亥」跟「己亥庚子間」的不同，王崇煥生於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，光緒二十五年王懿榮得甲骨時，他不過八歲，相信年譜中「己亥」之說的，則認為「雖然當時王崇煥只有八歲，也該記事了。」^⑯而對其後所提的「己亥庚子間」之說，則又有人認為「王懿榮發現甲骨文時，作者不過十歲左右。因此，他在文章中說王懿榮發現甲骨之年是『光緒己亥庚子間』，他做為非當事人，聽到的傳聞難免有含混、籠統之處。」^⑰連作者的兒子都難免含混、籠統，其他的說法，也都難免只是傳聞。當時的「當事人」王懿榮並沒有留下任何有關甲骨文的文字，另一個「當事人」，是賣甲骨給王懿榮的古董販子范維卿，他「可稱甲骨發現一事的重要證人」，^⑱他說王懿榮購藏甲骨是光緒二十五年的事。

至於王懿榮對甲骨文認識到什麼程度呢？他兒子先是說「審定為殷商故物」，其後說「始知為殷商卜骨」，恐怕也是得之傳聞的成分居多。董作賓《甲骨年表》一九〇〇年條下記載，范維卿、趙執齋二人先後售甲骨予王懿榮。「當時士夫議論紛紛，多詆為偽品，王氏謂所記皆商代帝王之名，且文字奇古，必是殷商遺物。」《甲骨年表》於甲骨發現初期，凡所記述皆標所據，惟此則獨無，恐亦是得之傳聞。一九〇三年《鐵雲藏龜》出版，劉鶚自序定為「殷人刀筆文字」，^⑲則是否在一九〇〇年時王懿榮已先知其「必為殷商遺物」，恐亦不能確定。陳夢家說前引王崇煥的說法「乃是事後的追記，因此有將後來的已知者混入的」，這段話用來評論大部分有關王懿榮和甲骨關係的介紹，應該都是合適的。

⑬ 原刊於王崇煥，〈王文敏公年譜〉，《中和月刊》4.7（1943）：18-33。1971年廣文書局曾印入《年譜叢書》，2002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重新整理的年譜，「改正原來錯誤的斷句和明顯的誤字」。

⑭ 此年譜有填諱者李孺在甲子（1924）年寫的序，則年譜至遲在1924年應已完成。

⑮ 王崇煥，〈古董錄〉，《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》50（1933.10.10）：第二版；51（1933.10.25）：第一版。

⑯ 如呂偉達，〈甲骨文之父·王懿榮〉，頁43。

⑰ 王宇信，〈甲骨學通論〉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9，增訂本），頁26。

⑱ 李學勤，〈王懿榮集·序〉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9）。

⑲ 劉鶚見甲骨文「以天干為名，實為殷人之確據也」。又說：「不意二千餘年後，轉得目睹殷人刀筆文字」。見《鐵雲藏龜》劉鶚自序。

王宇信在《甲骨學通論》中，花了很大的篇幅辯證王懿榮確是發現甲骨的第一人，這一點殆無疑義。至於王氏對甲骨文認識到什麼程度，則無可論斷，但王氏必認識到甲骨文是一種珍貴的文物，否則不可能花錢去購藏。汐翁〈龜甲文〉稱「正儒故治金文，知爲古物」，應是恰當的說法。

二、陳介祺與甲骨文？

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《陳簠齋致王廉生手札》稿本六冊，首冊封面題記：「計六百頁，皆係考據金石文字者。」書內尚夾著購買發票，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，以480元的代價購於寶古齋。

其中第四冊有一封陳介祺給王懿榮的信，信中提到甲骨文。全信的內容如下：

廉生仁兄大人左右：前月蔣賈來，攜古龜甲數十片（共八十餘片，以二十六金購之），云近出於古姜里西二里名麟村者。土人掘土得之，而質太弱畫又纖細，拓墨不易，故擇其文之奇者書呈吾兄攷定。弟謂古刀筆書即龜甲文字也。甲文既出於刀筆，庸峭古勁，觚折渾成，然則契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觀，迄今數千年，我輩復能見之，古福何可勝算也。手此即請台安，不具。愚弟陳介祺頓首。四月十五日。

信後並附了十八片甲骨的臨寫和考釋。

這一封信沒有署年，無法推定其年代。陳介祺卒於一八八四年，就算這封信是陳氏生前最後一年寫的，也比上文討論的甲骨文發現之年一八九九年早了十五年。果真如此，則甲骨文的發現至少應提前十五年，這是甲骨學上何等重大的事。而信後所附的臨寫和考釋，更絕非發現初期所能辦到，則實際發現的年代更要提前。

必須承認，這六冊手札，字跡與陳介祺十分神似，用字遣詞也是行家裡手。我在北京國家圖書館，費了一天半的功夫讀了其中大半，確實收穫不少。但其甲骨的論述，與我習知的相差太遠，卻又覺得似曾相識，手邊完全無資料可查，在將信將疑中把全信抄了下來。我在讀這六冊中，唯一篤定其可疑的是全帙中唯一的一方「海濱病史」的白文印，但這不足以斷定書稿的真假。

幾經翻查，終於水落石出。那一封信的主要內容，抄自孫詒讓的《〈契文舉例〉敘》。至於那十八片甲骨，考釋全襲自郭沫若《卜辭通纂》，臨寫則任意裁剪，以致我一開始想從辭例找尋其出處，多數徒勞無功。

孫詒讓的敘，相關文字是這樣寫的：

然則契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觀，迄今數千年，人間殆絕矣。邇年河南湯陰古姜里城培土得古龜甲甚夥，率有文字，丹徒劉君鐵雲……定為殷人刀筆書。余謂……刀筆書即契刻文字也。甲文既出刀筆，故庸峭古勁，觚折渾成，恍若讀古書手札。²⁰

兩相比較，不得不佩服作偽者組織變化的功力。同一「刀筆書」，孫氏的「余謂」，陳氏的「弟謂」，一字之差，幾令甲骨學史的序幕全面改寫。其抄自《卜辭通纂》者，多屬節錄，可以不論。

該六冊手札，前後筆跡一致，應是一人所為。仿陳介祺的字也極像，文章也文從字順，雖多方抄襲，亦頗能融會貫通，全文順得極其流暢，作偽者一定不是等閒之輩。《卜辭通纂》出版於一九三三年，這個偽本應該是在此後至一九五七年之間產生的。

作偽者在文詞上幾乎做到天衣無縫，但仍有疏忽處。如在上面所提到手札的下一封信，署年是丁亥，這是一個幼稚的錯誤。跟陳介祺有關的丁亥年只有一個，即一八二七年，那年陳介祺才十五歲，王懿榮還沒出生；下一個丁亥則陳已過世三年。而陳與王訂交始於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此後至陳介祺故世，更絕無丁亥年。

這六冊「手稿」既為偽作，則有關陳介祺與甲骨文的種種，只能視為無中生有了。

三、王懿榮與金石學

王懿榮雖然因第一個發現甲骨，而贏得「甲骨文之父」的大名，但他對甲骨並沒有留下任何文字，更沒有任何研究心得。而他在金石學和經學上，則有重要的論述，只是被甲骨的美名所掩，反而較不引起重視。王懿榮能第一個認識到甲骨的可貴，跟他金石學的修養必有密切關係，否則至寶當前，又何能知其所貴。

在《王懿榮集》²¹中，其卷四為「考古雜著」，主要搜集王懿榮金石方面的文章，但數量不多。而他與清末金石大家的往返書信，往往有更精彩的內容。陳介祺書



²⁰ 孫詒讓《契文舉例》成書於1904年，1908年最後寫定。樓學禮校點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3）。

²¹ 呂偉達主編，《王懿榮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9）。

信中，給王懿榮的信是最多的，²²但王懿榮給陳介祺的信，卻苦無所見。在《王懿榮集》的卷三「書札」裡，並沒有任一信是給陳介祺的，這對探究二人的金石論點，是一種很大的缺憾。

在陳、王二人往來書信中，常有非常重要的見解，但因資料不甚易見，而往往被忽略了。如經學上很有名的「寧王」和「文王」的釐清，一般都認為是吳大澂提出來的，²³其實在吳之前，王懿榮已先言之矣。

《尚書·大誥》的「前寧人」、「寧王」等，²⁴舊說常迂曲難通，自吳大澂《字說》的〈「文」字說〉論定「寧」為「文」字之誤，成為利用金文校勘經書的一個著名的例子。²⁵《字說》刊成年代為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，²⁶而在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十月十三日陳介祺給潘祖蔭的信裡，已提到王懿榮有此說法：

《尚書》至今無從得確據以實之，其理之至者，固可以孔孟程朱之說定之，其文之古者，則唯吉金古文可以定之。吉金古文，亦唯《尚書》可以通之。福山王廉生農部懿榮書來，謂〈大誥〉甯王、甯武皆古文字作作之譌。余謂「文人」見《詩》，「前文人」見兮中鐘、西宮殷，尤不可移，則〈大誥〉之為真古文亦定矣。……則「文王」、「文人」說，極為有見。²⁷

同年十月晦陳介祺致王懿榮函也提到：

即如大著識〈大誥〉甯為文之譌，雖未可即以為是而不闕疑，推之〈君奭〉之「甯王」，亦皆从文為長。又金文之體例句讀，亦皆可證《尚書》。²⁸

王懿榮提出這個意見的時間比吳大澂早了十年。裘錫圭先生認為「吳、王二人是好友。王氏之說為吳氏所聞，或吳氏之說為王氏所聞的可能性，都是存在的。但是從他

²² 陳敬第輯，《簠齋尺牘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19），全帙12冊，其中第4-7冊為致王懿榮函札，為數最多；陳繼揆整理，《秦前文字之語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1），共五卷，卷二為「致王懿榮書」。

²³ 如劉盼遂，「寧王即文王之說，實自吳清卿啓之。」見《觀堂授書記·觀堂學書記》劉氏按語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5），頁62。屈萬里，《尚書集釋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3），亦引《字說》之說，見該書頁136。吳大澂之後關於寧、文問題的討論很多，詳見程元敏，〈《尚書》寧王、寧武、寧考、前寧人、寧人、前文人解之衍成及其史的觀察〉上、下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）創刊號、第二期。

²⁴ 寧或作甯，今本作「寧」。段注謂「音義皆同」（《說文》甯下注）。

²⁵ 裘錫圭，〈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《尚書》的一個重要發現〉，原載《古籍整理與研究》4（1989）。又收入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73-80。

²⁶ 顧廷龍，《吳憲齋先生年譜》（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5），謂吳大澂於光緒十二年三月初五日「書〈「文」字說〉一篇」（頁131），而作於光緒九年八月初三、四的《說文古籍補·敘》（頁105），已謂「魯恭王所得壁經，又皆戰國時詭更變亂之字，至以文考、文王、文人讀為寧考、寧王、寧人。」是至遲光緒九年吳氏已有此說，但仍比王懿榮晚了九年。


²⁷ 《簠齋尺牘》第一冊：《秦前文字之語》，頁40。

²⁸ 《簠齋尺牘》第四冊：《秦前文字之語》，頁89。

們的學問品行來看，似乎都不會掩友人之說為己有。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是英雄所見略同。」「從清末金石學和經學的發展水平來看，發現《尚書》『寧王』、『寧武』、『前寧人』等文中的『寧』是『文』的誤字，並不是一種很困難的事。幾位學者不約而同地看到這一點，並不奇怪。把這一發現主要歸功於吳大澂或某一個人，恐怕是不恰當的。」²⁹

幾個學者不約而同的提出類似的見解，而吳大澂說法之所以特別引起注意，我認為這跟出版的時間及文章的性質有關。吳大澂的《字說》在光緒十二年就刊行，而陳介祺的信，則直到民國八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印行，雖然陳氏談此問題的信，早在同治十三年就已寫出，但除了收藏者，在民國八年《簠齋尺牘》出版前，並沒有人有機會知道王懿榮曾經有此說法。此外，《字說》是說解文字的專著，較容易被研究金石文字的人注意，陳、王的書信雖然談論金石的內容頗多，畢竟不是文字專著，比較可能被忽略。陳介祺的六世孫陳繼揆整理《秦前文字之語》時，在每卷卷端都有一篇陳介祺致書對象的簡介，在卷二「致王懿榮書」的簡介中，特別提到簠齋於同治十三年給潘祖蔭那封信的內容，或即含有表彰之意。

在《簠齋尺牘》和《秦前文字之語》相繼出版之後，我們得以知道王懿榮早有此說，但那是經由陳介祺的轉述，王給陳的函札，仍無從追蹤，似又不無遺憾。我在研究、整理簠齋藏札時，對此問題一直耿耿於懷，甚至懷疑這麼重要的原件是否尚在人間？最近得到北京大學畢業的孫俊同學的幫助，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珍藏善本中，找到了這封「踏破鐵鞋」的重要文件。此信長達 16 頁，是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王寄給陳的。³⁰信中內容非常重要，其中關於「寧」、「文」之辨的內容有：

姪前年與張香濤同居時，嘗謂自朱子識破古文《尚書》為偽，而國朝知為今文《尚書》之學者數家是已。《尚書》為經中之史，然欲治今文《尚書》，徒求古注不可，蓋漢人已不識古文矣。此非廣收古器文證之不可，斷無二義可通，止有古器文時代與之相近耳。欲治《尚書》而不知鐘鼎古文，猶隔膜也。吾輩何試為之？香濤云然。姪嘗舉一事示之，出古器銘文內，文考字作字者示之，香濤便悟之而大樂，蓋此字形絕似甯字，以知「甯王貽我大寶龜」、「率甯人有茲疆土」，甯王、甯人即文王、文人。此不俟前人煩言而解，此猶涉也。又「救甯武圖功」，前人反覆說之不明，不知此甯字亦是文字，若讀作「救文武圖功」，又明白曉暢，不煩言而解矣。謂非古器文之有益于《尚書》乎？（圖一）

²⁹ 裘錫圭，〈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《尚書》的一個重要發現〉，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，頁 76, 78。

³⁰ 此信但署「六月二十二日」，未署年。從其信中所言「六月二十一日接奉本月六日賜書，知月二日得姪五月二十二日夜病中復上之書」，知其年為同治十三年。該年六月六日陳寄王信見《秦前文字之語》頁 24，內容與此相符。陳介祺函札向有署年的習慣。

古今

論衡

夢何誠爲之。蓋漢之世，亦嘗舉一事，而之出，其銘文內文考字作金字。
其示之者，漢便悟之，而大業蓋此字形，絕似甯字，以知甯王，其大業龜
辛甯人有蘇甯^{孫士}王甯人，即文王人，其字此不倭前人，頓之而解此，猶少
也。又教甯武國功，前人及覆說之，不明不知此甯字，亦是文，字若漢作穀
文武國功，又明曰曉暢，不欲言而解矣。其非古，忘文之有，是于爲書字，其
漢國曰木曰從革，之義之從革，前人矣。王說革爲黃字，之誤，古忘文，朱黃
幽黃黃字，形与篆文革字相近，新弄大布黃巾，黃巾橫今西人檢物學書
有金在礦，其性從橫，固是知此与上文之爲之性而矣。上与潤下相

圖一：王懿榮致陳介祺函札手稿（北京國家圖書館藏）

以「寧」、「文」為例，強調古器文字對研究古書的重要性。對於古器文字的認識，王懿榮亦有精闢見解，同信中說：

故又嘗謂古器之文不可強識，其時理使然。譬如古刀幣文字紀地、紀數之文，皆當時貴賤婦孺日習慣，不求識而自識者。而今之通才博學，反不能盡識者，其時理使然也。釋古器文有一字之確者，則人人聲入心通，可以證古經之一義，亦復人人自然無異議，若一人稍有疑迴，是其釋必有未確切處，不令人同此心，一語道破，雖夷狄仇讐不能異詞也。若必執一器而逐字字釋之，則其勢必有所不能，其理必有所不通，勢必至於穿鑿傅會，強古人之文，以就我之心曲，硬為古人造言生事，如巫姑扶乩一般，真可大笑。故執一器而欲字字釋之，真大惑也。

其說極為合理。然而釋古字、古經，要做到「人人自然無異議」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王懿榮除用金文與《尚書》相證發外，尤重古本《尚書》。曾有〈請復古本《尚書》〉附入《十三經注疏》與今本《尚書》並行疏，以為清儒關於古文尚書的撰著「網羅放失，守闕抱殘，所錄古文為真古文，所采古注為真古注，視晉唐以來所行之『今本』《尚書》，實為有漢相傳古書之遺文，亦即為去古稍近之真本。」且「擬並請特旨，通飭各省督撫學政各官，嗣後凡遇大小考試，命題至《尚書》一經，準其兩本並用，頒為功令，以資永遠。」³¹這樣的論點，跟他「性嗜三代鼎彝文字」，並以金文與《尚書》證發的治學態度不無關係。

四、王懿榮致陳介祺書

陳介祺書信現存者，以致王懿榮為最多，書信往返討論金石文字，頗多勝義。陳致王書開始於同治十二年，直到光緒十年五月廿三日與王懿榮最後通信，是年七月二日陳氏卒。這十二年中，陳致王書有七十餘通。³²

³¹ 《王懿榮集》，頁19-22。

³² 其中光緒三～七年無書信往還，「其時先生曾往四川探視，河南訪友，書或有間。」（陳繼揆卷頭語）又陳介祺與王懿榮交往情形，參看呂金成，〈陳介祺與王懿榮交往鄰視〉，《陳介祺學術思想及成就研討會論文集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325-339。

陳介祺致王懿榮信函最多，具見於《簠齋尺牘》及《秦前文字之語》。而王懿榮致陳介祺的信，於理亦當不在少數。陳介祺信中提到的，有近三十封，實際當不止此數。王懿榮致陳的信頗不易見，《王懿榮集》卷三為「書札」，收錄王氏致書十四人，共 196 通，竟無一是給陳介祺的，可見王致陳信之不易得見。陳繼揆云「至於先生書札手迹，吾家悉皆珍存，裝裱成冊。聞秉忱叔祖言，五十年前，尚見家人謄錄，今已不知尚在人間否？」

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有《王廉生致陳簠齋書笥》，八冊，經摺裝，共計 774 頁，主要是王懿榮寫給陳介祺的信札，也有幾通為別人寫給王懿榮的書信（其中包括吳大澂寫給王懿榮的），均為手稿。王寫給陳的信都沒有具年，其寫作時間待詳考。³³此外，尚有福山呂偉達抄本〈王懿榮致陳介祺信札〉，收錄情形待查，³⁴其抄本所據底本亦未知。

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王懿榮致陳介祺書札手稿十通。其中一函稱「壽翁世年伯」署「四月晦日上」者，有云「姪婦轉劇，所謂知其不可，而安之若命，則今日之事矣。」按王氏元配黃夫人光緒三年八月歿，此信當是光緒二、三年間所寫。其餘九封稱「簠齋姻世伯」或「簠齋姻世年伯」等，當是光緒八年以後的事，因光緒八年八月王懿榮嫁次女崇煥給吳重熹的次子封，而重熹是陳介祺的女婿，也就是說陳介祺的女兒是王懿榮的親家母，於是陳、王就有了姻親的關係。這九封信均不署年，甚至連月日也沒有，從內容推敲，並參酌陳致王函所提到的事項，推定其寫信時間在光緒九年和十年。

在陳、王往來書信中，討論最多的當然是金石之學，也有關於拓片的酬酢或文物的買賣。王懿榮的財力顯然不如陳介祺，「力不能置重器，則於璽印、泉貨、古陶所收極富。」³⁵王給陳的信上提到「貝子府有彝器七十餘，索直千金，姪不敢過問。」³⁶而陳介祺在咸豐二年以千金買下一個毛公鼎，兩人財力相去甚遠。王懿榮最為人樂道的購藏甲骨，當時「每版價銀二兩」，比起千金重器，只不過小巫見大巫。

王懿榮在給王松溪的信中，提到自己因「貧病交加」而「求之不得」的心情說：

預計窮年及急債之不可緩，如此壯年，如此磨折，……復何論功名事業耶！

³³ 此資料承北京大學孫俊同學代查，謹此致謝。此外，該館書目中尚有若干王懿榮致他人函札。

³⁴ 註³³所標示之呂文中提到該抄本，並言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。

³⁵ 〈致王懿榮書〉卷頭語。

³⁶ 光緒十年三月七日王懿榮致陳介祺函札手稿，中研究史語所藏。

古今論衡

又說：

弟貧病交加，窮至今日，可謂已極，然仍想一但錢來，若舊本書……，使我今夕有錢，皆將有之。若許賒，則不惜重價。不然，即學赤松辟穀，並飯連菜俱不喫，比飴之兄還省亦可。若銅器、泉、印、磚瓦等等，皆吾夢寐，皆吾嗜好。稍有一時不貧，一時家無病人，種種不饒。凡此皆與吾兄同情，第二人不能知此況味也。³⁷

把「無力」的收藏者的心情描述得入木三分。



圖二：「翟煞鬼墓石」拓片，端方舊藏。
(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藏)

《鐵雲藏龜》自序提到王懿榮身後仍負債的情形說：「壬寅年（1902）其喆嗣翰甫觀察，售所藏，清公夙債。龜板最後出，計千餘片，予悉得之。」³⁸其經濟之拮据可以想見。除甲骨售歸劉鐵雲外，古器物亦有散出。如王致陳信提到的北齊墓石翟煞鬼，王「得自山東臨淄」，³⁹後為端方所得，⁴⁰最後被魯迅在琉璃廠買到，⁴¹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。（圖二）

金石的交換訊息與切磋心得外，陳、王往還的信中，也有不少對時局的憂思。陳、王的晚年正值清政府最積弱的時代，列強入侵，清政府一籌莫展。陳、王信中時有悲憤無奈之語。如陳介祺在光緒十年三月十二日給王懿榮的信上說：

³⁷ 《王懿榮集》，頁 230-231。

³⁸ 《甲骨年表》稱：「王懿榮之子王翰甫，出所藏古器物，清宿債。」少一「公」字，易滋誤會為翰甫之宿債。

³⁹ 光緒九年七月五日王懿榮致陳介祺函札手稿，史語所藏。

⁴⁰ 端方《陶齋藏石記》（清宣統元年石印本）：「亡女翟煞鬼記，石高七寸，中廣四寸三分。五行，首兩行四字，後三行行二字，正書：天保七年八月八日亡女翟煞鬼記。」（卷一一，頁 7）

⁴¹ 《魯迅日記》：「戊午（1918），四月十四日晴。大風。星期休息。上午往聖安寺吊許季上夫人。午後往留黎廠，以重出拓片就德古齋易他本，作券廿，先取殘畫象一枚，作券四元，又買北齊《翟煞鬼墓記》石一方，券廿，云是福山王氏舊物，後歸溧陽端氏，今復散出也。下午馬幼漁來。李霞卿來。」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9），頁 311-31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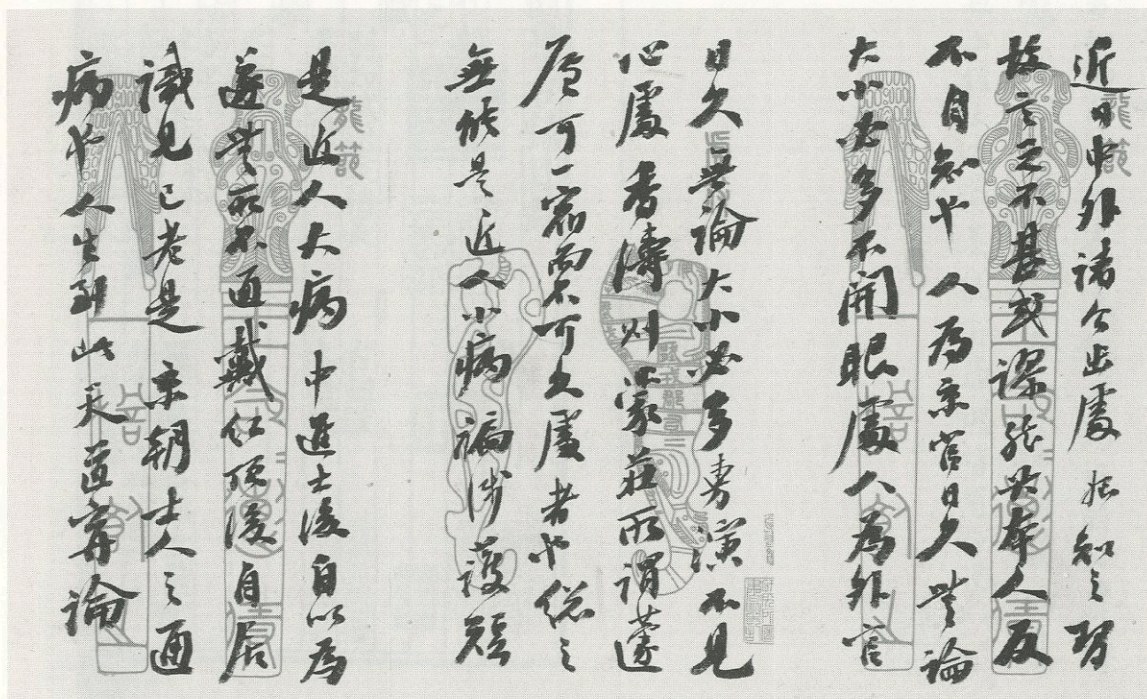
越南消息惡劣，滇粵恐亟。今日中國民不知兵，兵不知戰，猝募之眾，何以禦敵。即未早圖之，亦不可不再急圖之。無如今日事，皆是君民中間一段作不到認真二字，遂事事無可如何，有何可說乎！⁴²

王懿榮的信中，則更多憤激語，尤其對官場的無能、徇護，更不以為然。如：

邊事一和，則中國愈窮，再接再厲，何所底止。諸公衮衮，真敗軍之將；世無英雄，華夷擾攘，主少，國家多難，正今日之事矣！⁴³

又如：

人爲京官日久，無論大小必多不開眼處；人爲外官日久，無論大小必多專演不見心處。……總之，無能是近人小病；徇涉護短是近人大病。中進士後，自以爲遂無所不通；戴紅頂後，自居識見已老，是京朝士人之通病也。人生到此，天道寧論！⁴⁴（圖三）



圖三：王懿榮致陳介祺函札手稿（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）

⁴² 《秦前文字之語》，頁 137。

⁴³ 光緒十年三月七日王懿榮致陳介祺函札手稿，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。

⁴⁴ 光緒十年三月九日王懿榮致陳介祺函札手稿，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。

比起陳介祺，似更多激切語。同是憂國憂民與對官場的不滿。陳介祺選擇辭官歸里，而王懿榮則選擇「致身君國」，終至以身殉國。

光緒二十二年王懿榮的母親謝太夫人病逝。王懿榮給他次子崇烈的信說：「吾父母無不能奉養矣，此後之致身君國者，赴湯蹈火亦不敢辭。」以父母均已亡故，再無後顧之憂，殉國之念，應已始于此時。⁴⁵光緒二十六年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王懿榮以「京師團練大臣」不能守國，自謂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」而投井殉國。

從王懿榮信中所透露的憂時激憤語，似乎已可看出其以身殉國之氣節。

⁴⁵ 〈王文敏公年譜〉。